

艺术·人·真诚

—钱谷融论文自选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艺术·人·真诚

——钱谷融论文自选集

华东师范大学

(沪)新登字第 201 号

艺术·人·真诚
钱谷融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20006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江苏如皋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0 插页： 字数：500千字
1995年4月第一版 1995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本

ISBN 7-5617-1296-0/I·119 定价：平 20.00元
精 23.00元



钱 谷 融 先 生

序

王晓明

大约半年前，我间接听到一个疑问：“钱谷融先生的名气这么大，为什么文章却不多？”我很能理解这个疑问，十五年前，我做钱先生的研究生的时候，一边搜读他的文章，一边就也在心里发生过这样的疑问。记得有一次，他指着自己那张堆满了书，几乎不容他再铺开稿纸的书桌，笑说道：“我这个人太懒，喜欢读，却不喜欢写”。我竟暗暗地有点同意，以为先生确实是懒了一些。转眼之间，十五年过去了，回想自己当时的幼稚和简单，不免会觉得好笑。我甚至由此猜想，我最近听到的这个疑问的发问者，一定也是非常年轻的吧。

也是在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知道钱先生读大学时曾写过许多颇具风致的散文，有的还引起老师的热烈称赞，在后面批道：“非深于情者，不能作此文！”他二十四岁时还写过一篇文言的《说水（述志）》，特别引起我的注意。他用长长的排比句式，描绘江河雨露的千姿百态，最后说：“是以其为器也，窈漠无形，变化无常，乘风凭虚，卑以自居，甄有形于无欲，领大惠于群生。使身而能化也，吾其为水矣。”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自然容易有阔大的抱负；但他又要“甄有形于无欲”，像水那样取一种“卑以自居”的低姿态，却明显是表现了他性情的另外一面。再联想到他同时候写下的那些多情的散文，我就不由地要认定，那敏感而多情的因素，实

在是占了他天性中很大一个比重的。他并非没有刚性和雄心，但从内心最自然地流露出来的，却首先还是热烈、天真与谦和的性格。

但他却遭遇了一个严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越是热烈而谦和的人，往往越容易受到践踏。四十年代的战乱自不必说，就是五十年代之后，种种粗暴的对待也还是接踵不断。他写了一篇《论“文学是人学”》，就受到那样大规模的批判，上海有一家出版社，竟打算连续出版那些所谓的批判文章。虽然他没有被打成“右派”，此后的处境却一直岌岌可危，他成了一面触目的“白旗”，随时都可能被拔掉。甚至他给学生讲完课，刚刚离去，都会有预先布置好的“革命”教师上台“消毒”。再以后，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会遭受怎样的折磨，也就不必细说了。直到1978年，他已经当了三十六年讲师，却仍然被排除在申报副教授的名单之外，仿佛依旧是某种无形的另册中的人物……

即使是像我这样在“文革”中长大，对种种反常现象并不陌生的人，有时候也很难体会，在钱先生陷入的那种生活氛围里，人要维持自己的良知和人性是多么困难。或许是因为天性，他很少采取那种宁折不弯的对抗姿态，倒是常常以忍让和退避的方式，来缓解外界的压力。他由此养成的有些习惯，也一直保留到很久以后，甚至我们做他的学生了，私下里还曾诧异过，说怎么从不见先生与别人据理力争。他对人生采取这种种的低姿态，内心当然会有痛苦。有时在闲谈中，他会对人生的惨淡的一面，发出那样深切的喟叹，就足以令人窥见到他的痛苦的深广。但我想，他年轻时那种对水的向往，是不是又会使他从这低姿态中感受到别一种意味呢？忍让当然是忍让，退避也当然是退避，但只要内心的方寸大致不乱，又何尝不能将这忍让和退避转变成某种隐约的超脱呢？你和钱先生接触越久，就越会从他的温厚和谦和背后，感受到热烈的爱憎之

心，与他对散淡超脱的向往同时，还分明涌动着对邪恶的强烈的反感，对庸俗的毫不掩饰的轻蔑。我有时确实暗暗感慨，他经历了那么长期的严酷的生活，却还能保持这样一份正常的性情，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而我现在更多了一个猜测，那《说水》所体现的甘居弱势的天性，是否也是助成他这“不容易”的一个原因呢？

以钱先生的天性，即使不继续先前的散文创作，也会成为文学的爱好者和批评家。他越是想避开污浊的现实，就越会自觉不自觉地沉迷于文学世界之中，当外界的压力一天天加重的时候，他大概也只有在书房里静静读书，才能获得片刻的松弛和欢愉吧。有时候，对伟大作品的感动，竟会成为人体验人性尊严的唯一途径，我想，钱先生对他的写作，内心里一定是极为看重的。当然，就在这一方面，他也常常是采取了低姿态。比方说，自《论“文学是人学”》遭到批判之后，他就几乎再没有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文学见解，他宁愿通过具体的作品评论，一点一滴地表现这些见解，却无心再做《论“文学是人学”》那样令人侧目的长论。他渐渐形成了一种宽容含蓄的文风，很少写否定性的批评文字，即便有时候非得要说上两句，也总是异常温和，甚至根本就不露痕迹。自然，最能表现他这低姿态的，还是他在写作上的“疏懒”。一般而言，从事文学生涯的人，越是善感多情，就越可能勤于写作。从钱先生早年的散文来看，他分明正是一个勤于用笔墨表达心绪的人。即便后来从事文学批评，情形也还是一样，为了学校里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他会一口气写出三万多字的《论“文学是人学”》，就说明他那枝笔是多么勤快。可是，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社会环境，却似乎越来越不能容忍一个人再像先前那样真诚地写作，在动辄得咎的形势下，恐怕也只有随时自我调整的人，才可能保持勤奋和高产。这样的自我调整是极不容易的，它常常需要某种特别旺盛的欲望作为动力。可是在钱先生，这样的欲望却不怎么强烈，他就只剩下一条路了，那就

是不断地停笔。中国的文人固然有好名的传统，却也有“狷者有所不为”的古训，当文章上的功业竟要以谀世作为代价，洁身自好的人便只能放弃它。功名心是淡漠了，疏懒的习性也确实渐渐养成了，八十年代以来，钱先生的文字仍然不多，大概也有几分是由这习性造成的吧？但我要说的是，他却也因此更多地保留了一份内心的坦然，和同时代的许多人相比，他似乎并没有付出那么重的自我迷失的代价。

这就是他那些为数不多的文章，为什么却能获得很大声誉的原因。不单像《论“文学是人学”》那样的长文，当时就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就是《管窥蠡测》一类的短文，在发表二十年之后，也仍然使我这样的年轻人感到佩服。就如他在整个人生道路上，常常以退避来保全心灵的健康一样，他在写作上也正是以“疏懒”换来了风格的一贯。无论写什么文章，他总是面向艺术和诗意，谈作家对人物的创造也好，谈批评家对艺术的感受也好，谈一个抽象的理论命题也好，谈一出戏剧、甚至一首词的结构也好，他投出的始终是一种审美的眼光。他给自己的一本论文集取名《艺术的魅力》，正是非常确切的概括出了他从事批评的兴趣所在。正因为总是在谈论艺术，他就常常能自然地袒露情怀，他的笔端总是带着情感，从容不迫，娓娓道来，那种诚恳亲切的口吻，确实非一般人所能摹仿。他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要有“事外远致”》，在我看来，他自己的文章就常能表现出对这境界的追求。他笔下绝少峻急愤激之气，从娓娓道来的风度之中，你倒常常能感受到一丝飘逸的气息。即便分析一个很小的细节，他也总能向你传达出对于博大的艺术世界的向往。他的文字远离匠气，更没有那个时代司空见惯的呆板和矫情，倘若不是心中远远地悬着那一个“事外远致”的境界，这些怕都是难以做到的吧。不用说，他的文笔的最大特色，就是对人情和人性的一贯的尊重。只要有可能，他总会以各种方式表露他

的这种尊重，强调文学是“人学”也罢，辨析文学的“特征”和“魅力”也罢，他的根本立论都在这一点上。说起来，这应该是人人能懂的道理，并不算怎样的深奥，但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要像这样固执地重复这些道理，却又分明需要勇气，需要坚守良知的决心。在一个连基本的是非都颠倒了的社会里，能够不丧失对于普通的人情物理的正常感觉，已经不容易了，再要坚持把这些感觉说出来，就更加难得。八十年代中期，钱先生在自己一本书的后记里，这样写道：“三十年来，我们的国家在前进道路上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变化之大是十分惊人的。而我的这些文章，大家可以看到，对艺术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却是前后相当一致，很少大起大落的变化。这，一方面固然多少显示出了自己的一点诚实之处，不轻易人云亦云地去谈那些自己还没有认识到的，或者还不十分理解的东西，总希望竭力做到使自己所说的和所想的能够比较的保持一致。但另一方面，却也充分说明了自己的驽钝，适应性太差，不能与时俱进。不过，如今当我动手来辑录和整理这些旧作时，却也因此而几乎可以不必作什么改动，很少有因为形势的变化而不得不修改自己的观点或某些提法的情况，这一点，却也是很可自慰的。”在那一代作者当中，能这样坦然回顾的，又有几人呢？

一个人的写作会具有怎样的意义，除了来自他自己的愿望，恐怕更多的还是取决于时代环境的作用，即如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就有许多在学术价值之外，又兼具一种证词的含义，以至有论者公开断言，说批评的意义正在于为时代作证。我也很愿意这样来理解钱先生的文字，它们不但是一种学术研究，体现了他对文学、艺术和人类社会的种种看法，更是一份深具个性的证词，记录了他所遭遇的那个严峻的时代，以及他在这样的时代中苦苦挣扎，竭力保持人性和尊严的精神历程。十几年前他给我们授课，曾和已故的许杰先生一起，反复强调做人和作文的关系。当时我并不完全理

解他们这些话的深意，直到我自己也从事文学批评，逐渐感受到了手中这枝笔的份量，才渐渐明白了，他当初为什么要反复作那样的叮嘱。虽说今天的许多情况，都已和三十年前大不相同，文学批评所承受的严重压力，大体上却似乎依然如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写作同样并不单纯，我们同样是在向社会和历史提交自己的一份证词。事实上，也正因为看清了这一点，当钱先生嘱我为他这部自选集写几句话的时候，我才能排除种种的犹豫而欣然应命：对他回顾写作生涯时的那种坦然的态度，对他那种无需将自己的证词多加删改的轻松的心境，我是太向往了。

一九九四年七月上海

目 录

序

王晓明

且说说自己	1
对人的信心,对诗意的追求	16
——答友人关于我的文学观问	
论托尔斯泰创作的具体性	22
关于陀斯妥耶夫斯基	48
——《舅舅的梦》中译本序	
读《高尔基与茨威格文艺书简》	55
论“文学是人学”	62
附录	
我怎样写《论“文学是人学”》	106
关于《论“文学是人学”》	117
《论“文学是人学”》发表的前前后后	128
文艺创作的生命与动力	134
管窥蠡测	150
——人物创造探秘	
关于文艺特征的断想	161
关于艺术性问题	170
——兼评“有意味的形式”	
不可无“我”	178
“真实”与“真诚”	181

要有“事外远致”	184
艺术的魅力	188
谈文艺批评问题	209
评论家应该首先是读者	223
引进与创新	226
争鸣三境界	230
保持理智的清明	233
我的意见	236
——在上海市第二届中、长篇小说奖评选会上谈	
希望看到更多的力作	241
真诚·自由·散淡	244
——散文漫谈	
有情致，有诗意	250
——《柯灵散文选》读后	
纯真的爱心，清新的文字	253
——尤今其人其作	
性情之作	259
——陈炳熙《南京姑娘》序	
对文学的执着和追求	271
——序饶茺子《文学批评与比较文学》	
值得欢迎的探索	275
——鲁枢元《创作心理研究》序	
不必羞愧的缪斯女神	278
——我看通俗文学	
小说与“闲书”	288
我看小说	293
“特写”与“小说”	297

试说话剧台词	302
关于旅游文学	310
——《现代作家国外游记选》序	
诗人与电影小说	314
——《海山之恋》序	
文学与爱情	318
——《文学中的爱情问题》序	
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	321
鲁迅的小说	354
纪念鲁迅话研究	365
论《祝福》的思想锋芒	374
——祥林嫂是怎样死的?	
谈《伤逝》	386
“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394
——重读鲁迅小说《风波》	
观察与沉思的结合，外界与内心的交融	402
——鲁迅《秋夜》讲析	
曹禺戏剧语言艺术的成就	418
关于《雷雨》的命运观念问题	463
——答胡炳光同志	
“你忘了你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啦!”	471
——谈周朴园	
“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483
——谈蘩漪	
“哦，你是你的父亲的儿子”	493
——谈周萍	
“夏天里一个春梦”	506

——谈周冲	
“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516
——谈侍萍	
“那——那天上的雷劈了我”	529
——谈四凤	
“这本帐是要算清楚的”	541
——谈鲁大海	
“哼，他忘了他还是个人”	551
——谈鲁贵	
读书、治学与写作	560
一、与自学青年谈读书	560
二、谈治学	568
三、《汉语写作大辞典》序	569
怎样学好中国当代文学	573
文学的社会作用与文学的艺术性	578
——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点想法	
个性·启蒙·政治	583
——与吴俊关于中国新文学的对话	
《鲁迅创作心理论》序	589
《郭沫若思想整体观》序	593
困惑与遗憾	598
《郁达夫新论》序	600
《个性·自我·创造》序	605
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	611
——答《文艺报》记者问	614

后记

且说说我自己

我一向不愿意谈自己。这倒不是因为别的，只是觉得自己实在一无可谈。人既平庸，经历又极简单，如果也一本正经地向人们大谈起自己来，岂不是太可笑了吗？尽管自己所写的文章，曾受到过大规模的批判，但这样的事，过去在我们这里多的是，有什么值得谈的？不过，却就正因为这一点，竟使我顶了一个作家的头衔，居然被列入四川文艺出版社所出的《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一书之中。六年前，我曾应该书编者的要求，把自己的主要经历，像流水账似地简单写了一下。现在，编者来信说此书即将重版，希望我能把自己的传略作些补充修订，如能重写那就更好。我把过去写的东西重新看了一下，觉得确乎写得太枯燥乏味了。虽然自己平凡的一生，原本就难于引起人们什么兴趣。但既然要写，就得多少能让人了解到一些你的真实的思想感情，真实的性格。如果只是一些简单经历的交代，使人读起来味同嚼蜡，甚或像咬到涩果子那样难受，那就太对不起编者和读者了。所以这次我几乎全部重新写过，目的无非是希望能使读它的人少皱几次眉头而已；究竟是否能如我之所愿，那就知道了。

我原来的名字叫钱国荣，现在用的是笔名。一九一九年九月生于江苏武进。父亲早年教过私塾，因此当我一个比我大二岁的哥哥要上学读书的时候，尽管当时镇上早已办起了小学，他却仍把我哥哥送进了邻村他朋友办的一个私塾里去。我当时还小，本不到

上学年龄，因为朝夕跟哥哥在一起玩，便也吵着要跟他一起上学，父亲也就答应了。第一天去拜老师的时候，在红毡毯上向老师磕了头，老师很和蔼，还给点心我们吃，觉得很有趣。可是后来，就渐渐地感到太拘束，不如家里自由，就常常想赖学。可父亲在这个问题上很严格，决不容许。先是哄骗，哄骗不成就继之以打，最后还是被强送到老师那里去。记得老师教我和哥哥读的是同一本书——《千字文》。小孩子当然不会懂，老师也并不讲解，每天教一、二句，只教我们跟着他念几遍，然后就让我们自己念。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我们背诵。每次我都能流利地背出来。我哥哥却常常要打格顿，甚至要老师提示。于是老师夸我聪明，我自己和家里人也都以为我比哥哥聪明。在私塾大概读了有一年多点吧，镇上那个被当地人叫做洋学堂的小学，逐渐得到了人们的信任，我老师的私塾办不下去了，我父亲才把我和哥哥送到镇上的小学去。因为我们已经读过一年多的私塾，可以不必从头读起。当小学里的老师拿我们读过的《千字文》来考我们的时候，我尽管能够“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地背诵如流，但当老师用手遮住上下文，单独指着一个一个的字要我认时，我就几乎一个也不认得了。我哥哥过去虽然常常不能背诵，却每一个字都真正认识。所以考试结果，我哥哥进了二年级，我却只能从一年级读起。记得那时是一九二七年的下半年，我已经八岁了。

在小学里读了六年，我一向是班上成绩比较好的一个，老师都很喜欢我。特别是五年级时候的一位老师，我还记得他叫王自治，字眺越，是绍兴一带的人，据说是大夏大学毕业的。他对我特别好，教了我一年就离开了。临走时，还特地把他的一部《天雨花》送给了我。并郑重地把我托付给一位同他比较要好的徐老师，要他以后多照看我。升到六年级时，教语文的级任导师谢老师，是新来的，刚从江苏省有名的省立无锡师范学校毕业。一次上作文课，我

的卷子他批阅后发下来时，写了这样的批语：“从别处抄来，何得掩人耳目？”我很惊诧，去向他说明这是我自己写的，不是抄来的。他非常主观，仍一口咬定我是抄来的。我要他指出是从哪里抄来的？他非常自信地说是从《模范日记》上抄来的。当时这本《模范日记》很流行，我就找了一本拿去要他指给我看是抄的哪一篇？他当然找不到，但还是支支吾吾地不肯爽快承认是他冤枉了我。我小孩子家，受不得这冤屈，就在他的批语后面反批道：“批评之权在老师掌握之中，学生何敢乱道，然而……”这还不算，又在要交给老师看的日记中，把这件事写了出来，不指名地说，有一个老师硬把学生自己写的文章说成是抄来的，像这样的老师实在是太没有资格了。而且还标上《胡批》的题目。老师看了，并没有就我所记的内容表示什么意见，只在文后批了“字写大一些”这样几个字。老师是近视眼，但他之所以这样写，也许是为了可以让人理解为他根本没有看过这篇日记吧。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了。不想我的一个正在江苏省立扬州中学高中部读书的表兄，忽然来我家玩，看到了老师的这句批语，并听我说了事情的经过，便怂恿我说：“他要你字写大一些，其实你的字已够大了，谁叫他自己是个近视眼呢？你可以反问他：‘你看不见吗？’”我当时实在不懂事，又抱着一肚子的委屈和愤懑，就真的照他的话在老师批语后面反批上“你看不见吗？”这样一句十分无礼的话。这下子这位谢老师就忍无可忍了。第二天上课时，他怒气冲冲地把我叫到他的讲台旁用戒方当众打了我十来个手心。他别的不提，只抓住我的“你看不见吗？”这几个字，说，“我今天就打你的‘看不见’。”我当时年幼，太不懂道理，实在做得太过分了。不知道我的谢老师如今是否还在，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了，而且我当时已经为此挨过打，我仍旧要在这里诚恳地请求他的宽恕。后来，王自治老师临走时拜托他对我多加照看的徐老师知道了我被打的事，特地找我谈了一次话，一面安慰我，